

# 重庆知识青年移民及其文化研究

邓 晓 何 瑛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从1953年到1981年,举国上下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广泛而持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曾经涉及全国大部分家庭,且产生过极大影响。四川是人口大省,当时隶属四川省的重庆市曾有数十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政策性移民的组成部分,重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重庆移民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就重庆知青的移民运动、移民前后的生存状态、知青的返城与困惑、知青的移民文化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重庆;知识青年;移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6—0054—09

《中国知青史——初澜》的前言,对“知青”定义如下:认为广义的知青“系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sup>[1](前言)]</sup>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策,牵动了全国大多数家庭,且产生过极大影响。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53年《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sup>[2]</sup>首次提出由国家出面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模式起,到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sup>[3]</sup>出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

“上山下乡”是一场政策性移民。究其目的,该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是为了完成“一五”垦荒计划、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缓解城镇毕业生升学、就业难题、输送农村文化人才。60、70年代,则旨在摆脱“三年困难时期”后的农业发展和“文革”期间大批毕业生积压困境。到80年代结束该运动,则主要是适应“文革”后,百废待举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时也基于当局对这场运动的反思,对返城呼声的回应。<sup>[4](538,附录表5)]</sup>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出了《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该《总结》的评价及在该问题上学界的共识,顾洪章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有过专门讨论。<sup>[5](243~257)]</sup>其政策性移民性质毫无疑问。于是,刘小萌指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它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着新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sup>[4](前言)]</sup>这场运动产生了举国上下数以千万计的“知青”移民,其中仅重庆就达到了数十万。由此,讨论重庆的“知青”及其文化便有了重要意义。

## 一、重庆知识青年的移民运动

笔者定义“知青”为移民,首先是因为他们在事实上进行了迁移,其次是他们的户口也随之迁到了

收稿日期:2012-09-17

作者简介:邓晓(1957—),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何瑛(1963—),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移民史研究”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三峡移民史》(CQZDZ11,2008-12-10)的阶段性成果。

定居地。和全国一样,重庆“知青”的构成亦包括两个群体:拥有城镇户口未能继续升学而“上山下乡”的青年,家在农村外出读书毕业后又回乡务农的“回乡青年”。无论是“离家”或是“回家”,均为“响应国家号召”,属于政策性移民。在重庆,占绝大多数的城镇“知青”是移民的主体,本文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以下笔者就其移民去向、移民方式、运动反思三方面进行探讨。

对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去向,主要分为两方面,即:到云南军垦农场的“支边青年”、到周边农村的“下乡青年”。

### 1. 支边青年

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支边青年”可谓较特殊的一部分。他们除了接受“再教育”外,还担负着“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任。但在本质上他们移民边疆的主要原因仍应是就业压力。

1969年,“珍宝岛”事件使中、苏间局势十分紧张,在边疆布置后备力量被提上议事日程。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最好的“屯兵”处所,而应届中学毕业生便成了最佳人选。于是,大批应届毕业生就从不同城市被选送到了其对口的生产建设兵团。其中,1971年的3至8月,重庆市区各中学向“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送了24400多名初中毕业生,前后共计发车24列,分别安排在一师(红河洲)、四师(西双版纳洲)、独立一团(文山洲)等地。因为是准军事化建制,毕业生报名十分踊跃,又由于事关国家安全,对兵团战士还进行了政治审查与挑选,“家庭成分不好”的被排除在外。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70年3月1日,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与缅甸、老挝、越南毗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接收知青共104000人,其主体分别来自上海、重庆、北京、成都、昆明等城市,其中以上海最多,重庆次之。据《重庆大事记》载,自1971年3月到7月“全市已有24000多名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到云南参加生产建设兵团”<sup>[6](528)</sup>。

与上山下乡不同,生产建设兵团采用的是部队建制,兵团战士的基本待遇如下: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知青最为集中,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其主要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为使他们安心扎根边疆,四川省革委慰问赴滇支边青年代表团重庆分团还专程前往慰问。<sup>[6](532)</sup>

### 2. 下乡知青

重庆知青移民的地区,较远的有巴中、内江、涪陵、达县、万县、忠县、邻水、奉节、巫山、彭水、秀山、酉阳、黔江等地,较近的则有江津、南川、巴县、江北县、大足、綦江、万盛等周边农村。1962-1979年,四川省辖区内安置下乡人数合计142.74万(其中不包括到外省插队的人数),仅次于辽宁与黑龙江。<sup>[5](259~260,附录·附表2)</sup>统计数据表明,四川省未接受外来知青。<sup>[5](261~262,附录·附表3)</sup>重庆是当年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其知识青年移民占全省的比例可想而知。

重庆市先后掀起了两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第一次是从1964~1965年,笔者所见重庆知青最早的官方记载是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1966年2月15日)透露的信息:“会议报道,近两年,全市已有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sup>[6](487)</sup>其后,经历了“文革”开展和“武斗”时期(1966~1968)的短暂停息。人们约定俗成地将“文革”前下乡的知识青年称为“老知青”,以别于之后的“新知青”。他们的回忆文章被收录在名为《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sup>[7]</sup>及《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续集的书里。<sup>[8]</sup>

第二次是从1969年~1978年,1969年1月初,市革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举办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造舆论,迅速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热潮。”2月份全市即有1.2万知青分赴内江、涪陵、万县等地农村。<sup>[6](513~514)</sup>随即揭开了“新知青”上山下乡的序幕。

“新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在速度和数量上大致呈递减关系。1971年12月底,“市革委”宣称“3年来全市已有20万人到农村”<sup>[6](580~581)</sup>。据1976年底统计:“自1968年以来,全市已有32万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sup>[6](552~555)</sup>至1979年1月中共重庆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称“重庆先后有40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sup>[6](581)</sup>。“40万”这是笔者所见当时官方公开的最终统计数据,该数据应该包括“老知青”在内。到1978年重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已近尾声,据当年9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

作会议”精神,下乡知青“主要补充到办得较好、有发展前途的现有场队知青点中去,要充分利用老场的安置条件,包括已办的社队企业”<sup>[6] (577)</sup>。从“补充”二字可见,上山下乡的规模已经很小了。

重庆“知青”的移民方式,早期主要是在市级相关部门安排下,以学生毕业学校为牵头单位与相应区县对接,以单个知青到生产队独立落户为主,每个生产队或大队接纳1至数人不等;其它还有投亲靠友、自行联系(挂钩)等方式。1973年7月,国务院全国安置工作会议做了如下调整:“1. 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也可以回老家落户;2. 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3. 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sup>[5] (196)</sup>此举旨在进一步规范和便于知青工作,但真正推广开来是在1974年。自1975年开始,重庆市学习株州经验,由过去的分散插队改为厂社挂钩、集体安置。“到1976年5月,全市办起青年场、队600多个,青年点1500多个”<sup>[6] (541)</sup>。

作为重庆市南岸区知青工作小组成员,原重庆市五中(广益中学)老师李长禄回忆:1969年他们奉命到忠县、奉节、巫山等县,协助当地做好接受该区知青的安置准备工作。随之学校成立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展动员、组织工作。当时,全社会各行业、企事业单位、街道革委会均齐心协力地予以配合,广播、报刊、标语、报告则大力宣传。“那时,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是,既要不折不扣执行上级的指示,又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内心深处还是有些茫然,担心知青远离家庭、学校后到了艰苦的环境里能不能适应。”在欢送现场,“也有不少的家长为子女离去伤心落泪,抱头痛哭”。在农村,当地政府组织民众欢迎知青,然后由各公社把他们接走安置。此后又有了第二批、第三批知青在忠县、万源、邻水等县插队落户。到1970年后学校又根据上级布置,组织动员新三届(超龄生)上山下乡及参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直到1978年。<sup>[9]</sup>从李老师的回忆中,我们看到政府组织、宣传的给力。在当时物质十分困乏的年代,下乡知青甚至可以凭下乡证明购得当时市场上难得见到的手电筒、蚊帐、蓆子、暖水瓶等,这可视为举国体制的另一种表现。当然,在李长禄的回忆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的困惑,知青及其父母的惆怅。

重庆的“知青”移民运动持续时间长、数量大、涉及面广,它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安排、有宣传、有落实的政府行为;“知青”移民和他们的家庭,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前后不同,但总体上是消极的;即便是执行者对它的意义也并非完全理解,并且他们的家庭同样也被卷入其中。

## 二、重庆“知青”移民前后的生存状态

在这场移民运动中,首先政府的作用正如定宜庄所指出:“……总的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sup>[1] (前言)</sup>其次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强大的政治宣传引导知识青年要有所“作为”的愿望,极大地推动了知青的主观能动性,并成为前期上山下乡规模大、热情高的重要原因。再次由于上山下乡是举国大事,中央精神通过层层政府的努力,贯彻到了广大农村,出于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赖和朴实善良的本性,农民们在自己生存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接纳了这些城里来的青年。

具备了政府、知青、农民三个基本前提,我们便有了从主、客体两个方面去讨论重庆“知青”移民前后生存状态的可能。

主体——重庆“知青”移民的生存状态。

移民前的生存状态。在知识青年下农村“大有作为”和“接受再教育”的宣传背后,政策性移民的原则显然是刚性的。事实上到后期,上山下乡基本上变成了被“自愿”。刘小萌在书中就引用了几则重庆市的事例,它们在当时被作为四川省的先进经验推广:“重庆钢铁厂从公司到厂、车间、处室,据说共有近200人做职工子女下乡动员工作;重庆啤酒厂有5位职工子女不愿下乡,厂革委就出动5名委员分别包干动员;重庆轮渡公司缆车站只有1名职工子女未下乡,革委会便派1名委员负责家长的工作,同他一起劳动,说服他送子女下乡……”<sup>[4] (107)</sup>显然,不愿意下乡是“动员”的前提。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

基本程序大致为:学校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填写“志愿书”(表明是自己主动申请的)——组织批准(几乎没有不批准的)——准备行李(采买必须用品)——尽快出发。与此相对应,如果毕业生不写申请书,则被视为政治思想觉悟低,学校、家长所在单位及街道革委会将派人上门反复动员,父母还需在其单位的学习班中“提高”觉悟,直到孩子上路为止。

事实上,当时毕业生如果不下乡便没有了就业空间。他们既无法升学、招工,又不允许从事任何临时工作。不少知青是为了不连累父母,也为了自尊“不在城里吃闲饭”,才写申请“自愿”报名下乡的,这与当时宣传的“十分踊跃”不尽相符。而在当时,最受人羡慕的反倒是毕业后“依政策”可以“缓走”与留城的学生。“缓走”的前提主要是,该生因残疾或患有某些特殊疾病而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留城的则指独生子女或父母身边留一人(其他子女均下乡或不在身边)。这既体现了执行政策柔性的一面,同时少数特权者也有了办假证明的可能,“开后门”一词亦由此产生。

移民后的生存状态。移民初期,知青的热情是高涨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积极的。有过改天换地的理想、也付出过辛勤劳动,出现过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先进分子”。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中落后的思想意识,并对农民的后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的敢做敢为也受到了农民群众的赞扬。但久而久之,随着对农村艰苦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村社政府后续工作的不到位以及城镇对移民政策执行的误区,对前途的无望使他们的热情渐渐冷却。

重庆知青移民的心理特征有下述几点:其一,由于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他们经历了热情冷落及由此带来的孤独;其二,由“同病相怜”而产生较强的群体认同感,在大事上往往互助、齐心(包括打群架);其三,经历了由艰苦生产、生活带来的生理、心理的不适应期;其四,部分人对其文化优势的自负,导致其大材小用、生不逢时的失落感;其五,大多有过对前途的迷茫,并一度出现心理失衡。这些特征与全国的知青群体大致相似,直到顶替、招工、恢复高考等一系列面对全体知青的国家政策出台后才真正有了改观。

客体——因政府与农民态度逆转而变化的生存空间。

初期的友善接纳。这时广大农村干部对中央的知青移民政策是拥护的,尽管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不一定理解这次运动的真正目的。他们更多地是把知识青年看作是“毛主席派来的”、是“城里的干部”,并由衷地欢迎。他们说服村里的农民腾出自己的房屋、拿出自己的珍藏盛情地接待他们。出于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赖、对干部的服从和朴实善良的本性,农民们在自己生存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接纳了城里来的青年,尊敬并善待他们,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后期的消极对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干部与村民们对上山下乡的政策,对知识青年群体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于是,初期的尊敬变成了同情,起初的盲从也变成了消极对待。同时,还有三个因素干扰了上山下乡政策的执行:一是少数知青在农村的表现不佳,引起了农民的不满,甚至引发矛盾;二是少数农村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对知识青年吃、喝、卡、要甚至迫害,这导致了中央“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六条办法出台;三是知青以种种方式陆续离开农村的事实,使农民认准知青迟早都要回城,他们只是过客,不值得下功夫。

移民生存状态前后变化的原因。该转变无论在主体还是客体方面,都与“文革”宣传中“上山下乡”本质发生变化带来的自相矛盾有关。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按当时的官方界定:建国后17年我国基本上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由此便推出了学生是反动路线牺牲品的结论,于是送他们到农村去“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便很有必要了。这样,“上山下乡”运动的性质就不再是宣传先进文化,而知识青年也由文化的实施者沦落为被教育者。这一质的转变让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及其家长始料未及,接着便出现观念、乃至实践上的混乱。而这一知识青年需要“改造”的理论定位,则赋予了后期刚性实施移民政策以潜在依据。

重庆“知青”移民前后的生存状态是不乐观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对他们移民性质定位的偏差,导致了城乡对移民运动本身的认识混乱;其次,是知识青年自身对未来的前途迷茫,这与艰苦环境和政策的变动性相关;第三,是农村对他们的态度由热转冷,这与农民自身的贫困和干部认识的偏颇相系。

### 三、重庆知青移民的返城与困惑

重庆知识青年移民的返城,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这与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前阶段移民回城需要选拔。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允许知青逐步返回城市,其理由不尽相同,但形式基本一致,即“选拔”。此前,我们注意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移民被要求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唯有在“支边”(需要政审)和农村条件好坏(需要特权)的选择上有差别。而在返回城市的过程中,家庭成分不好的知识青年除了因父母病退、顶职等特殊方式外,以参军、招工、招生(工农兵学员)等名义返城的都没有他们的份,这凸显了那个时代强调阶级斗争的特色,而普通市民的子女也几乎无望。只有家长在城里有地位的、有办法的以及在农村表现特别突出的少数知青才得以回城,同时亦有一些农村青年凭借父母手中的推荐权,“搭车”进了城。

移民后期知识青年的大举返家。知识青年移民返城高峰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百废待举、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前提”。“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为知识青年移民返城提供了理论根据与实际的空间。其中,城市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空间,使街道工业、企事业单位的“大集体”等多种就业形式勃然兴起;而国家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又导致了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从此通过公平高考选拔人才的形式便沿袭了下来。于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短短数年间,绝大部分重庆知青得以各种方式陆续返回了城市,仅少数在农村结婚的知识青年按政策“落户”在了农村。期间,血统论逐渐被淡化了。

青春无悔?必须直面的困惑。知青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返城后的重庆知青大部分都融入了正常的生活、生产轨道,作为补偿,国家相关部门对知青计算了连续工龄(包括考入大学学习的知青),我们似可将此视为国家对当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性回应。在浩浩荡荡数十万人的重庆知青队伍里,出现了不少领先时代的精英,但确也留下了一些时代的后遗症,困惑与困境不可避免地在部分人身上发生。直到今天,我们仍对此无法回避。

青春无悔,困惑者的陈述。上世纪,当而立之年的重庆知青在80年代两手空空地回到城市时,弟妹们已长大成人,而家里还是那一两间老房子,他们不得不陆续面对就业、结婚、住房、孩子入托等难题;到90年代,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们,又面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企业改制的局面,“文革”造成的先天知识不足、年龄优势的消失,使之陷入下岗求职的窘境。进入21世纪,这些年近六十的“知青”技术不及技校生,体力赶不上农民工,即便寻找一份低薪的门卫仓库管理工作也不大容易。由于无法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他们难免发出青春无悔的慨叹。类似情绪我们在为数不少的“知青网”上可以看到。

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困惑。在这方面,重庆的支边青年群体反应最为集中。他们曾为当年从事的橡胶种植业是否属于“特繁劳动”和“有毒有害”工种与市里相关部门进行过交涉,因为从事有毒工种的男性可提前到55岁退休。该政策在工矿企业改制、倒闭、人员下岗及退休时与计算工资关系密切。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专门举行过有相关各方参加的座谈会。如今,在大部分当年的知识青年看来,能每月拿上15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已经很不容易了。

青春无悔,值得回味的人生。对那段年轻时经历的岁月,重庆知青是没法忘记的。那时,他们曾充满“战天斗地”的英雄主义激情,备尝独立生活的“艰难困苦”,他们难忘的还有乡亲们的纯朴与热情,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几年。时代的烙印已经深深地打在了他们的身上,无论有悔、无悔。浓厚的第二故乡情结,使“回家看看”成了他们的梦。于是,我们读到了以下一些文字:

今年是重庆支边青年赴滇40周年。1965年,来自重庆市中区的2000多名20岁上下的年轻人奔赴云南,为当地建设付出艰辛。40年后,为纪念这一历史时刻,3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重聚昆明,回首40年风雨历程……<sup>[10]</sup>

昨晚8点,朝天门码头,近500名知青乘坐一艘轮船,起航回他们的“第二故乡”丰都。40年前,他们坐着轮船,到丰都当知青。……面对滚滚江水,他们高唱《歌唱祖国》,歌声里,穿着红卫兵服装的知青,表演了一个个节目。人群里,一面面迎风飘舞的小旗帜上写着:“青春无

悔”。<sup>[11]</sup>

4月20日,一百多名曾在苍溪插队的重庆知青在苍溪欢聚一堂,重温四十年人生经历,共话第二故乡苍溪四十年来的巨变,展望苍溪美好未来。…知青们认为,当年是苍溪人民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们,是苍溪这块厚重的土地养育了他们,锻造了他们,让他们学会了坚毅刚强、奋斗拼搏,学会了感恩。<sup>[12]</sup>

对当年重庆知青“回家”,亟待借力发展的当地干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而当年的老农则是由衷地感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听说当年的‘知青妹子’来了,80岁的杨德寿5月17日一大早就搭车从龙凤赶到至诚街道来迎接。”<sup>[13]</sup>他激动于知青们没有忘记自己。

的确,知青们没法忘记那片热土。“重庆知识青年的胥红军曾是勐满农场六分场小学的一名老师,1979年随知青返城后,她一直挂念着这些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农场的孩子们。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都要给六分场小学寄来价值200至300元的儿童读物和小学生书籍。……27年来胥红军给孩子们累计寄书1740册5800多元,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和农垦下一代的成长献出了自己的爱心。”<sup>[14]</sup>

重庆知青移民的大返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其中两条主线是招工与招生。国家对知青移民计算连续工龄的做法,可视为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政府行为的确认。对此后重庆知青面临的困惑,一方面由其人生经历所致,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至于对青春“有悔”还是“无悔”的认识,则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对自己这段人生经历的主观评判,对此不同的人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知青移民的“第二故乡”情结是真实的。

#### 四、重庆的知青移民文化

由于重庆的知青移民运动涉及数十万人、二十余年时间、数十个万个家庭的数百万人口,因此也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在其本质上,它具有与全国知青移民文化相似的普同性,但因为地域条件等的差异,又有着自己的特异性。总结、探讨其文化特性,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该历史事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拟从文化的记录、文化的特征、文化的评判、文化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 1. 文化的记录

对重庆知青移民文化的记忆,主要是通过档案收集与著书回忆来完成。这也是有效保存历史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

官方的档案收集。重庆市档案局(馆)于2009年5月20日发起向社会各界开展为期半年的重庆知青档案征集活动,对象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插队、支边知识青年,物件为知青上山下乡的文件、简报、纪要,书信、日记、照片等。征集方式为,重庆市民可通过重庆市档案局进行自愿捐赠。

其对知青档案的概念界定如下:

一是决定、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件、简报、纪要、名册、统计资料、证书、购物券,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报刊资料、宣传画、标语、照片、录音录像、电影胶片、画册等;

二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边疆工作、生活所保存下来的书信、日记、笔记、文稿、手抄本、简报、倡议书、先进事迹材料、处分材料等文字材料,照片、证件、证章、票证、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奖品等实物;

三是重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发生的有影响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原始资料,重庆知识青年返城后在各行各业有所建树的代表人物档案资料;

四是重庆知识青年为纪念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创作的文艺作品原稿;返回当年插队(支边)的村社(连队)扶贫帮困,发展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资料记载;重庆知识青年社团(如重庆知青公会、重庆支边战友联谊会)组织的各类活动的档案资料。”<sup>[15]</sup>

知青档案是研究知青生活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该档案库的建立对于重庆市知识青年移民及其文化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市档案馆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民间的著书立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先后出版了不少著述,且大多出自知青的手笔。例如:《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知青沉浮录》、《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等等,其中不少涉及重庆知青。而由重庆知青以自己生活背景为题材撰写的出版物则有:《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逆神》等。这其中,既有讲“老知青”的也有谈“新知青”的,亦不乏“支边青年”的故事。

知青著述中有历史、有传记、有回忆录、有纪实文学、也不乏文艺创作的形式,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我们解读了知青文化。在2009出版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前言中,邓鹏指出:“知青文学不仅表现出对青春的怀念、对农民的感激,而且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使命感。”<sup>[8]</sup>(前言)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们越来越注重作为当事者对这场运动的反思。

## 2. 文化的特征

时代背景的相同,使重庆的知青移民文化在主体上与全国一致。笔者认为其特征主要体现为:英雄主义的旋律,浪漫主义的色彩,理性不足的思维。

英雄主义旋律。这是由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所决定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主导思想的支配下,敢想敢干,面对艰难困苦体现出无所畏惧的勇气,并外化为苦中作乐的革命乐观主义。文革中慷慨激昂的歌舞、绘画和文章成了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甚至常常激动于自己宗教般的真诚奉献和悲壮情怀。《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八角楼的灯光》、《抬头望见北斗星》等“文革”歌曲被他们喜爱。

浪漫主义色彩。这是由知青移民群体的高度年轻化所决定的,它更多的应该是青春萌动及人性的自然流露,即便是在意识形态控制极严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当他们乐观时,浪漫主义洋溢着青春的朝气,而当理想破灭、前途迷茫、心情失落的时候,浪漫主义又带上了愁闷与玩世不恭的意味。例如《你是谁》、《蒙山茶》、《梦回知青小屋》、《知青之歌》所表达的情绪和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再现的场景。

理性不足的思维。这与文革期间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接近宗教狂热的个人崇拜紧密相关,由于当时最高领导者的思考替代了整个政党乃至七亿人的思考,而整个国家的言行,都围绕着一个声音。于是,属于个人的理性思维便无从提起。这在知青文化中的反应,便是他们的歌曲、舞蹈、绘画及文学作品多表现出对精神领袖的盲从,以及浮躁、肤浅、缺乏深层次思想内涵的表现形式。

## 3. 文化的评判

对“知识青年”一词的辨误。在事实上,对当时的“知识青年”称呼除了“老知青”(文革前毕业)外,其他人实在很难承受得起,因为在文革中他们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文革中的非理性恶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恶补知识考上了大学,但更多的人在城里却面临“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困境。因此“知识青年”一词仅能相对于当时几乎处于文化蛮荒的农村而言。

知青文化具有内在的矛盾。一是知青文化中青年人的一大无畏勇气被政治宣传所绑架,而青春的萌动与反叛精神却顽强地体现。二是宗教般狂热、非理性的思维所造就的低层次艺术内容,削弱了艺术追求真善美的本质。这造成了知青文化中一些作品的粗糙、浅薄与空洞。

社会舆论的宽容与理解。2006年的8、9月,重庆市剧协与重庆晚报联合举办了首场“重庆知青文艺大展演”。8月10日,针对正在举办的系列活动,市内的部分专家举行了座谈,并就当时城乡普遍出现的以知青为主体、体现知青文艺的山庄演出现象,各抒己见。

时任市剧协主席的申列荣说:“当年的知青付出了青春和热情,他们的精神需要释放,他们不该被忽视或遗忘。……虽然知青时代有一些消极因素,但知青文艺应正面反映无私奉献、艰苦磨练、为社会创造价值等元素。”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陆荣还强调:“通过文艺的方式,将知青这一代的生活历史保存下来是知青文艺发展的方向。”与会者们认为,知青文艺不仅“捕捉那代人的心灵”、表现了“奋斗与创业责任与使命”,且作为群众文化,“‘草根’也登大雅之堂”。让这一代人的献身精神、奋斗道路、思想观念

得到正确的反映。<sup>[16]</sup>评价的基调是宽容与理解的。

#### 4. 重庆知青移民文化的影响

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知青文化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其歌舞、小品、诗文、绘画不但流行于当时的城乡,且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究其原因:首先,它是一种大众文化,因为“文革”与“上山下乡”运动交织在一起,且互为表里地关联着几乎每一个家庭,有着当时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其次,它的时代印记十分突出,造型上的高、大、全,绘画上的红、光、亮,节奏上的快、强、猛,加上表述的直白,形式的多样,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因而脍炙人口。只是时过境迁,在今天当我们重新品味它们时,除了重拾过去的回忆外,还平添了几分淡淡的忧思和耐人寻味搞笑的成分。

重庆的知青移民文化在形态上相对稳定且具较大渗透性。其稳定性体现在:就支边青年移民而言,他们不但拥有城市文化的优势,且因按部队建制生活与工作,加之时间不太长,因而在整体上其原居地习俗文化的变化不大。而新、老知青移民中,“老知青”因插队落户,其受移居地的影响,时间越长相对越大;而对知青场(点)的人来说,数十人聚居且与村落分离,时间最长不过4~5年,因而基本上保存了自身文化。同时,知青们较为频繁的返城还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农村文化的负面影响。从渗透性上看:知青移民的人数多、相对集中、文化先进、年纪轻等优势,对移居地的人们特别是同龄青年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新思维及生活方式方面。

在研究重庆知青及其移民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怪圈,即为适应“文革”政治斗争的需要,被偷换了的知青移民主题。撇开转移城里过剩劳动力的终极目的不谈,仅仅由于这一宣传主题的变更,知识青年便从先进文化的宣传者、拓荒者蜕变为被教育者。而让“深受反动教育路线毒害”(实际上拥有相对先进文化)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当时的现实是广大农村不但经济贫穷而且文化十分落后。城市青年在农村学会了忍受与吃苦,但这种“学习”的意义本身就需要质疑,因为他们和农民一样都不应该仅仅为了基本生存而历尽艰辛。真正让知青感动的,是农民对他们“落难”时给予的同情、援助,这在本质上也不是“教育”。反之,真正被改变的则应是农村落后的文化现状,是“被教育者”在客观上为“教育者”及其子女的文化扶了贫,尽管这种改变因为缺乏系统的组织实施而效果有限。知青移民在农村中的“作为”与他们在那个时代失去的青春相比,与国家受到的惨重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从该意义上讲,他们是半自觉地背负着十字架的、时代文化传播的苦行者。也正因如此,知青移民文化的内涵才变得复杂起来。重庆的人口众多,知青移民和他们的文化自然便在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地位。

## 参 考 文 献

- [1] 定宜庄. 中国知青史——初澜[M].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 [2] 人民日报[N]. 1953—12—03.
- [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Z]. 发布日期: 2009-3-25. 来源: 新京报网.
- [4] 刘小萌. 中国知青史——大潮[M].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2.
- [5] 顾洪章.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 [6]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重庆大事记[M].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9.
- [7] 邓鹏主编. 无声的群落——重庆 1964—1965 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Z]. 重庆出版社, 2006.
- [8] 邓鹏主编.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Z]. 重庆出版社, 2006.
- [9] 李长禄. 记忆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R]. 2009年4月11日在广益中学校友会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10] 重庆晚报[N]. 2005—07—07.
- [11] 重庆商报[N]. 2009—04—11.
- [12] 重庆知青欢聚一堂共话四十年人生沧桑[Z]. 四川苍溪县广播电视局, 2009—04—21.
- [13] 回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遍地青年下夕烟[OL]. 苍溪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 > 文章中心.
- [14] 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ynnk.com.cn/index.aspx>. 2007—06—04.

- [15] 新华网重庆频道 5 月 20 日电(高歆、陈婧瑶)[OL]. 2009—05—20.  
[16] 重庆晚报[N]. 2006—08—11.

## **Educated Youth Immigrant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Chongqing**

Deng Xiao He Y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0047, China)

**Abstract:** From 1953 to 1981, the whole nation has experienced a magnificent and victorious widespread and the lasting educated youth working in the rural or mountainous area movement. The campaign was involved in the majority of families, and produced great influence. Sichuan i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province, Sichuan province at that time is the Chongqing which ha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educated youth working in the rural or mountainous area. As national policy immigration part of Chongqing educated youth working in the rural or mountainous area movement is contemporary Chongqing immigration research important link, this paper carry on the thorough discussion from four aspects: educated youth immigration movement, immigration and survival conditio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o cities and confusion, educated youth immigration culture.

**Keywords:** Chongqing; educated youth; immigrant; culture